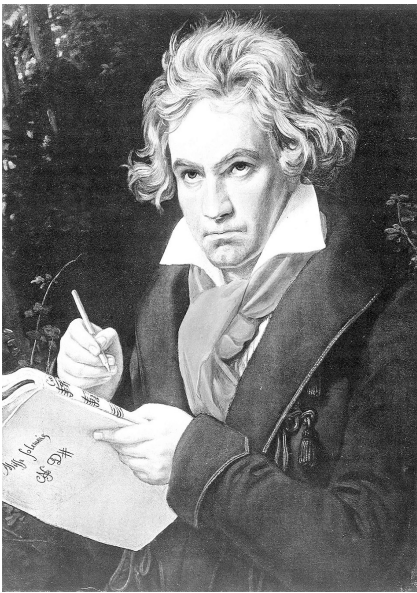


200年前,贝多芬推出合唱《欢乐颂》

今年5月,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为纪念德国著名音乐家路德维希·凡·贝多芬举办了一系列古典音乐会,主推贝多芬音乐生涯的重要作品——《第九交响曲》。200年前的1824年5月7日,这部传世名曲正式在维也纳首次公演。贝多芬在作曲时另辟蹊径,首次将声乐与交响乐结合,其中第四乐章的合唱《欢乐颂》更以崇高的立意成为传世之作,成为鼓舞人们精神的力量之曲。



贝多芬

1 贝多芬担任首演“副指挥”

1824年5月7日,当时已经阔别舞台多年的古典乐大师贝多芬重返音乐大厅,维也纳凯伦特纳剧院人头攒动,观众席中不乏重量级音乐家。那时的贝多芬听力不佳,担任这场演出指挥的是奥地利音乐家乌姆劳夫。贝多芬虽坚持同台,但他更像是一位“场上指导”。

音乐声起,贝多芬在乌姆劳夫身边聚精会神地打节拍。据乐团小提琴手回忆,舞台上的贝多芬“如痴如狂”、手脚并用,时而高高站起,时而蜷身蹲伏,仿佛要亲自演奏每一件乐器、演绎出每一个音符。随着第四乐章的《欢乐颂》将演奏推向高潮,台下观众挥舞起帽子与手帕,多次起立鼓掌。而受听力限制,贝多芬打出的节奏要比实际演出慢上好几个小节,直至台上演奏完毕,背对观众的他仍然沉浸在自己的“进度”当中,还是乐团一位歌唱家走上前,让他转向观众席,感受台下对这位音乐英雄的最高礼遇。

《第九交响曲》在维也纳的首演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功。首演过后,德国《音乐广讯报》盛赞贝多芬“这位没有创作瓶颈的天才,带领我们走进了一个新世界”。音乐家车尔尼评论道,这部交响曲“富有清新、活泼的气息”,并称赞贝多芬这一原创作品充满着“力量、创新与美”。直至近年,英国古典乐领域的评论家马多克斯仍对这首交响曲赞不绝口,她表示:“音乐史上充满了各种转折点……而《第九交响曲》更是突破了交响乐的固有模式。”

与其他交响乐谱曲思路不同,《第九交响曲》首次加入了声乐部分——即《欢乐颂》的大合唱,故《第九交响曲》又被称作“合唱交响曲”。据了解,贝多芬的灵感来自他崇拜的德国诗人席勒,《欢乐颂》的歌词正是出自后者的同名诗篇,在其基础上做了一定改动。美国指挥家阿尔索普认为,贝多芬通过将诗词与欢快高昂的乐曲结合,传达出一种“更宽泛的”存在主义哲学,其中包括他本人对团结、宽容、和平与欢乐的信仰,特别是原作中“人类团结成兄弟”的诗文,这也是贝多芬的美好愿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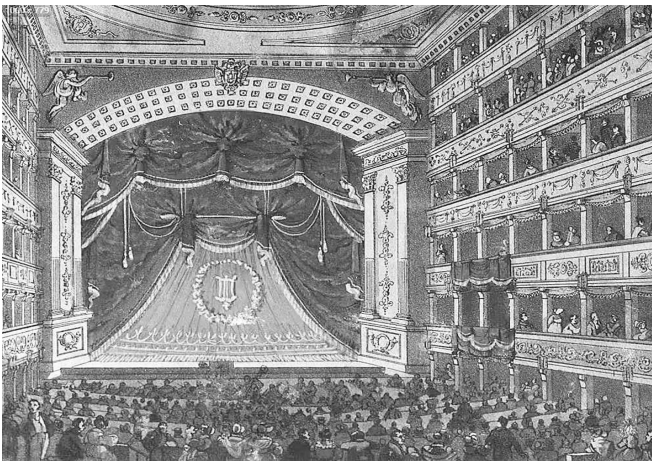
2 准备工作一波三折

尽管演出最终大获成功,但《第九交响曲》的问世十分不易,其演出准备工作一波三折。演出前的近十年时间里,贝多芬疾病缠身,还陷入了法律纠纷。此外,当时的维也纳乐坛受到“文化入侵”——意大利戏剧的受欢迎程度远超交响乐,剧院的数量多过音乐厅。在这样的大环境下,贝多芬原打算前赴德国柏林首演,是当地音乐人、庞大的粉丝群体获悉这一动向后,通过请愿的方式将他“强留”在了奥地利。

有媒体形容,《第九交响曲》的排练犹如一场“灾难”——时间紧、任务重,人员素质良莠不齐。受剧院档期限制,贝多芬需要在短时间内召

集一支建制完整的乐团。据英国“南岸中心”网站记载,《第九交响曲》只进行过两场完整的排练,参演人员中既包括职业乐手,也有不少“票友”,有的小提琴手难以驾驭高难度的曲目,拉到一半便停止演奏;还有乐手索性直接退出。

《欢乐颂》的合唱章节更是具有挑战性——合唱团不仅要耐心等待之前的乐章演奏完毕,第四乐章曲风突然高亢的转变需要他们快速酝酿情绪进入状态。当时舞台音响技术还十分有限,合唱团不仅要保证歌唱的音量能“盖过”乐器,还得能让后排观众清晰听到。为此,《欢乐颂》这一章的合唱险些“夭折”,是贝多芬坚持将其保留。



贝多芬《第九交响曲》在维也纳奏响。

3 大师生命中最后的乐章

贝多芬在1824年5月一共举办过两场音乐会,但由于前期投入太大,《第九交响曲》的成功并未给乐团带来多少收益,是典型的“卖好不卖座”。同年5月24日,贝多芬举办第二场音乐会,有称这是贝多芬生平最后一次公演。1827年,《第十交响曲》尚未完成,一代音乐巨人抱憾离世,《第九交响曲》成了贝多芬生命中最后的乐章。

在贝多芬离世后近两个世纪的岁月里,他的音乐被称作“法国大革命在艺术领域的延续”,《第九交响曲》被誉为“一曲歌颂和平、追求平等的赞美诗”。其中,《欢乐颂》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,在全球范围广为传唱。美国诗人惠特曼说这支曲子是“对自然与人性最精辟的表达”,斯洛文尼亚哲学家、评论家齐泽克则表示,《欢乐颂》具有广义上的“文化适应性”,甚至能打破最极端的意识形态对立。譬如在苏联时期,《欢乐颂》被苏联当成“红歌”。

200年来,《欢乐颂》的旋律

无数次在各类重大场合奏响,或为鼓舞士气,或为呼吁和平、促进团结。智利军事独裁统治时期,妇女在监狱外的街道上唱起西班牙语版的《欢乐颂》,为身陷囹圄的同胞带来希望;柏林墙倒塌后,作曲家伯恩斯坦组织两德音乐家共同演绎此曲、欢庆圣诞。1957年,英国南威尔士的矿工邀请美国黑人歌手保罗·罗伯逊出席艾斯特福德节,虽然此行遭到美国当局的阻挠,歌手还是通过电话连线为工人们演唱。

此外,《欢乐颂》也是很多国际组织的正式或非正式会歌,被广泛应用于政治领域。2017年的G20峰会上,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特意选择《欢乐颂》作为“迎宾曲”。2023年11月,英国工党党首斯塔默表示《欢乐颂》最能代表该党派的政治理念——这番说辞惹火了英国不少“脱欧派”人士,因为这支曲子同时也是欧洲联盟的“盟歌”、欧洲委员会的“会歌”,是欧洲的一个象征。

据《环球时报》

阿根廷“祖国之母”曾多次被“遗忘”

近日,阿根廷新纸币“1万比索”进入市场流通,其正面印有阿根廷独立战争英雄人物曼努埃尔·贝尔格拉诺和玛丽亚·雷梅迪奥斯·德尔瓦莱的肖像。后者是一位黑色皮肤的非裔女性,被阿根廷人亲切地称为“祖国之母”,然而,这位英雄的故事曾多次被人们“遗忘”。

瓦莱的出生年份和身世并没有准确的史料记载,有说法称,她1766年或1767年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。阿根廷军方相关记录显示,她是一名“帕尔达”人,也就是非洲奴隶的后代。在瓦莱小时候,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经济增长让移民数量激增,其中也包括被贩卖到此的奴隶。瓦莱虽身为奴隶后代,她本人却是一名自由人,法律给予了她自由的权利,她结了婚,育有两子,一个是亲子,另一个是养子。

1810年,西班牙被拿破仑占领。布宜诺斯艾利斯随即出现权力真空,阿根廷人民在“五月革命”中推翻西班牙殖民当局,建立了“五月革命政府”。革命开始后,瓦莱和她的丈夫、孩子们一起加入“北方军”的辅助部队。

在图库曼战役前夕,瓦莱向阿根廷独立斗争的英雄之一——当时军队的指挥官曼努埃尔·贝尔格拉诺将军请求,允许她照顾在战斗前线受伤的士兵,为他们清洗、缝补衣物。但在贝尔格拉诺看来,军队不是女人待的地方,不建议瓦莱在军队干活。瓦莱没有听从将军的意见,坚持在军队后方照顾士兵,在战事激烈的时候,瓦莱还头顶水罐,冒着呼啸而过的子弹为前线的士兵送水。康复的重伤士兵十分感激其精心照料,有人推测,那时瓦莱就在军中获得了“祖国之母”的称号。她的出色表现让贝尔格拉诺将军授予其上尉军衔。

在阿沃胡马战役中,瓦莱负伤被俘。被俘期间,她多次帮助战友成功逃脱,而被敌对势力判处公开鞭打九天,还好她最终成功逃走。她的丈夫和孩子都在战场上牺牲了,但她还是选择回到军队,继续帮助受伤士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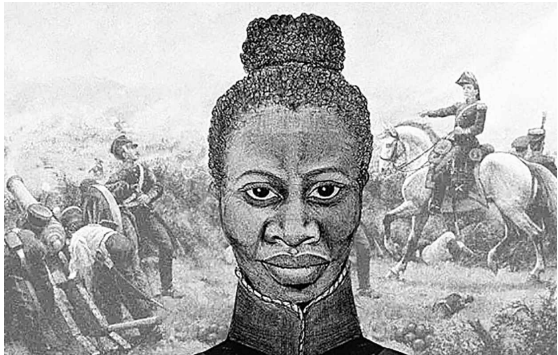
“北方军”的战斗任务结束后,瓦莱就回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。1826年10月,人们再次听到了她的消息,却不是她美满生活的消息——她把自己和家人在战争中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列于纸面,请求国家给予抚恤,但被当局拒绝了。1827年,她的战友胡安·约瑟·维亚蒙特将军在街上认出了她,这位昔日的战友已经穷困潦倒。在维亚蒙特和其他军官的帮助下,瓦莱向布宜诺斯艾利斯立法机关提交了一份养老金申请。

当时,阿根廷—巴西战争正如火如荼,这份申请的讨论一再被推迟,此外,当局还对这份申请持怀疑态度,理由是没有记录可以证明,瓦莱在这些战役中以一名士兵的身份作战。还好多名军政界人士站出来为她作证,最终当局同意给她步兵上尉的待遇,几个月后,她被授予骑兵军士长的军衔。1830年,她被调到预备役总参谋部,按军衔领取全额军饷。1835年,瓦莱被任命为现役总参谋部军士长。

阿根廷当局给予瓦莱抚恤金,并承认她是“北方军”的上尉,这没有让瓦莱的英雄事迹活在人们记忆里多久。19世纪中后期开始,阿根廷进入了“白化时期”。当时,阿根廷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将欧洲国家视为发展典范,认为要加入英国、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的行列,阿根廷需要在物质和文化上清除有色人种的历史影响。大量欧洲移民涌入阿根廷,加上当时政府的有意干预,非裔阿根廷人口占比越来越低,他们对国家的贡献也逐渐被淡化,瓦莱的痕迹又一次被淡化。

21世纪开始,阿根廷国内对非裔的关注出现回暖,这种势头激励了一些活动家,瓦莱的事迹逐渐为更多人所知,2008年开始,她被公认为“祖国之母”。2010年阿根廷建国200周年之际,不少学者承认非裔在整个阿根廷历史上,特别是在独立战争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。瓦莱的英雄壮举也进一步获得公众认可,她于1847年11月8日去世,为表缅怀,阿根廷自2013年起将每年11月8日定为非裔阿根廷人和非洲文化国家纪念日。阿根廷官方称瓦莱“代表了成千上万为我们国家而战的非洲后裔”。

据《环球时报》



瓦莱